

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形成初探

——从『六大』到遵义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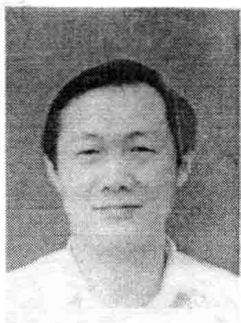
中共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何少琦 袁利民著 朱存福主编

遵义市包装彩印厂承印

作者简介

何少琦，男，汉族，1926年农历3月22日生于贵州省湄潭县县城义泉镇。1939年，年仅13岁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7月任中共湄潭县工作委员会宣传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湄潭县委干事、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书记，中共遵义地委政策研究室、农工部、党校干事、编辑、教员、党史教研室主任、副教育长，1982年底任中共遵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后历任副研究员、中共遵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顾问、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



袁利民，男，汉族，1955年农历8月8日出生于贵州省习水县城东皇镇。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当知青。1976年进厂当工人。1979年考入大学，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公社干部、区委副书记、地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县委副书记、地委副秘书长、地委研究室主任、市委秘书长等职务。在中央党校培训部研究生班学习四年，获研究生学位。

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形成初探

——从“六大”到遵义会议

何少琦 袁利民 著

朱存福 主编

(内部资料)

中共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

序

我以很大的兴趣看完了《初探》一稿,认为这个选题新颖,很有研究价值。就其内容来说,这史论结合的方式,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汇集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革命先辈在开创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过程中,突出了带有规律性的特点:从实际出发,探索求实,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经受严峻的考验,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从而领导全党夺取革命的胜利。稿中引用的史实,均出自有关的中央文件和党史专著,也是确切的。我想,这稿能付印问世,不仅将在党史界由此而引起的讨论中将这方面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而且为了吸取先辈宝贵的精神财富的滋养,增强抗拒腐蚀的免疫力,对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我希望它能得到出版社的支持。

中共中央党校 马齐彬

1993年10月19日于北京

目 录

引	1
“六大”的历史意义和“第三期”理论的影响	3
教条主义的决策失误	8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创及其发展	13
一、武装割据及“上山”思想的由来	14
二、建立根据地 夺取胜利的基础	22
三、“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28
四、特殊条件下的战略战术	33
土地政策的演变 土地革命路线的确定	41
一、土地革命初期的政治纲领	41
二、逐步完善的《土地法》	45
三、“查田”运动与分析农村阶级文件的公布	51
四、土地革命路线的确定	59
在“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决的”一场大争论	68
一、对统一战线认识的分歧	68
二、肃反扩大化的灾难	74

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后果	81
四、战略转移中错误的避战方针	94
五、一个历史的结论 领导核心的形成	98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出发探索求实	116
崇高理想的凝聚力 宝贵的精神财富	128
中国共产党“六大”至遵义会议大事记	143

引

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运动中,“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①列宁这段话,阐明了政党、领袖、群众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和领袖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领导了全国工农和革命人民,为摆脱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一改变亿万人民命运的伟大斗争出现在东方,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每当社会发展提出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时,社会就有一批杰出人物应运而生。”^②我们党初期杰出人物的代表,是为党的创立和在创建初期作出卓越贡献的“北李南陈”。其中李大钊烈士以生命殉难于追求的崇高理想,千秋忠烈,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陈独秀因对军阀野心家的进攻一再主张“让步”,^③导致大革命失败而离开领导岗位,最后离开党,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这就使党在幼年时期,由于不能形成一个胜任领导革命和为群众拥戴的领袖集团,因而使中国革命遭受挫败,推迟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揩干身上的血迹,高举革命旗帜,继续战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随即开展了遍及

全国的武装起义。到六大召开前夕,党领导重要的“农村暴动约 94 次,”城市“重要罢工 47 次”,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全国有省委 16 个,特委 38 个,县委 400 个,区委 41 个,特支 138 个”。到六届二中全会中时,党员人数从宁汉政府相继反共后的万余人“发展到 7 万 3 千多人”^④。这样星火燎原的武装起义,未能从根本上摧垮反动阶级的统治。可是少数的深入山区,开创了红色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97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5 月第 1 版,第 450 页。

③陈独秀的让步政策:1926 年 1 月 19 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会时,不同意“打击右派”政策,是政治上第一次“大让步”;同年 3 月 20 日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是第二次“军事让步”;同年 5 月 15 日,接受“整理党务案”是第三次“党务上大让步”,1927 年 6 月 30 日,承认国民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工农武装应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是第四次“投降式”的“大让步。参看《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19、121、123、171 页。

④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 4 月第 1 版,第 239 页。

“六大”的历史意义 和“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

当中国革命处在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等与革命前途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制定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①。大会“发布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基本上是正确的”,^②但“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如上述的“纲领”“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没有什么不妥”;“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有些就不妥当”^③。这是对“六大”的主要的正确和错误两个方面作出的评价,这次历史性会议后,由我党老一代革命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渐发展了正确的方面,克服了错误的方面,最终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引导革命向前发展。直到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举行了遵义会议。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历史意义,标志着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形成,表明党经受了极其严酷斗争后从幼年走向成熟。

“六大”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大地主、大官僚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其势力

所及的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日益强化法西斯统治,不断向各个红色区域发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的军事围剿。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运用于指导革命这个根本问题,党的领导人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些照抄革命导师著作中的某些条文,照搬国际经验的教条主义者,曾先后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与世界革命”的认识,以“六大”《政治决议案》中提出的“世界革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及第三阶段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几个基本矛盾“日益剧烈”,“便使世界革命的第三阶段的开始”^④的论点出发,分析和认识世界与中国形势。这一论点,至六届五中全会,一直是党中央制定策略方针和行动纲领的主要依据。

1929年6月,二中全会认为“世界革命已进到第三时期”,“全世界革命的火山都在冒火吐烟了。”^⑤由此而决定党的总任务是领导群众“从日常斗争发展到较高程度的政治运动,以准备群众走向武装暴动”^⑥。

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通过的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认为“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出于对革命形势的这种估量,强调“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并提出“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党的策略路线是:“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⑦。

1930年9月,三中全会认为“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剧烈到极点,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的末日”,赞扬“长沙十天的苏维埃都已经是新的革命爆发的‘进兵斗争’,——他开

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斗争”。“党应当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⑧。三中全会对“政治局报告的决议”中,曾指出“六月十一号的政治局决议案”中“犯了些冒险主义与左倾的关门主义错误”^⑨。同年10月发表的“告同志书”,号召全党“必须坚决实行反对右倾,‘左倾’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着火力反对右倾的主要危险”。对形势的认识是“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最近的将来,就要近接决定胜负的战斗”^⑩。

1930年冬,王明散发的《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是四中全会的“权威”论著的小册子中,着重指出第三时期的特点“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蚀而走向全面崩溃的时期”。由此而指责“主张退守的策略”,便是“取消派”。提出“符合”国际路线的“出奇制胜”的新“进攻”路线^⑪。

1934年1月18日,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认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中国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漩涡中,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式尖锐的提了出来”^⑫。

上述对各个时期的中国革命的形势的认识和分析,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总的指导思想,始终以“第三时期”理论为出发点而作出的论断,忽视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过分地夸大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的全面激化。在中国革命与世界的联系这个问题上,混淆了道义的支持与直接采取一致的革命行动的区别,错误地认为只要可以打开中国革命这个“突破口”,则必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崩溃。在策略上,抄袭“十月革命”的经验。这就脱离历史环境,尤其严

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长期存在的重要根源。这一根源,亦可追溯自“六大”期间,斯大林在指出中国“革命高潮”,“不是眼前的事”的同时,提出“只有当我们开始攻占最重要的城市的时候,才能够说革命运动处于高潮”^⑬。“六大”接受了这一观点,写进了决议:“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和无产阶级底高潮,都将要显示它决定胜负的力量”^⑭。1929年3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闭幕。在会议总结中对“第三时期”理论又作了进一步发展,认为“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而且中国工农革命的新“高潮的条件无疑正在成熟”^⑮。这对中共领导人中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六大”以后,盲动主义不但没有得到纠正,相反地以新的更“左”的形式发展起来。

注释

①《六大以来》(上),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内部发行),第10页。

②《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第1版,第690页。

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1、185页。

④同①,第12页。

⑤同上,第58、59、63页。

⑥《六大以来》(下),第10页。

⑦同上,第84、85、89页。

⑧同上,第93、95、97页。

⑨同上,第107页。

⑩同上,第113页。

⑪《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内部发行),第121、169页。

⑫同①，第 510、521 页。

⑬斯大林 1928 年 6 月 9 日同中共代表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谈中国革命问题，存中央档案馆，有关六大的会议文献档案。

⑭同①，第 9 页。

⑮《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丛书，1986 年 6 月第 1 版，第 241、242 页。

教条主义的决策失误

“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是在教条主义思想支配下形成的。这一时期,李立三提出“直接革命的形势”下的中国革命要在“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胜利,完成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同时挖苦那种所谓“睡在李树下等候李子落到口里来的最无耻的懒汉的观点”。认为夺取政权的“最主要的策略”是中心城市作“拼死斗争”,还说:“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只有“斩断他们的头脑,炸裂他们的心腹”,才能“制他最后的死命”^①。由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六届二中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作出建立“党的正确组织路线的枢纽:”“各县的工作中心必须从乡村中转移到城市中来”^②的决定。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提出“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方针”,强调“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的特殊意义,要求“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地方城市”,“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斗争”,组成为“暴动的中心队伍”。“红军的战略战术”“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向着革命的高潮飞速迈进”。当蒋介石与冯玉祥、闫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又提出“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③的行动方针。为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将党、团、工会组织视为“叠床架屋”妨碍行动的机构加以撤销。同年8月6日,正式成立由党、团中央及全国总工会领导机构合并组成的“中央行动委员会”,这一最高权力机构,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立三的“左”倾错误,可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左”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首先是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中国危机与革命运动》一文。提出“在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是最尖锐的”。据此鼓吹中国武装暴动已经完全成熟。东方部部长米夫 1930 年 4 月 28 日在《真理报》发表《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风暴》一文,认为:中国反动统治即将结束,要求中国党为迎接这一风暴的到来而“坚决的决斗”。接着同年 10 月 26 日《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传来,中共中央根据这一“十月来信”发出(96 号)紧急通告。提出闽粤赣省“全省总暴动”,“红军打到广州去”,与大城市开展的“总同盟罢工”相配合,“争取全国甚至全世界胜利”,并因此而认为武装工农群众是“保守”的主张,要求“一支枪都[要]集中到红军中去”。同时,全面接受共产国际对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批评,决定改造各级领导机关,为改组中央的四中全会作准备。

1931 年 1 月 7 日,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一手操纵下召开。全会批判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对瞿秋白、周恩来进行人身攻击式的指责。还说什么“纠正了党的政治路线”,“革新党的领导”,“引进”“有理论”的“新干部”“来做领导工作”^④。于是王明等人进入政治局决策机构。在会前 1930 年 11 月 25 日讨论接受共产国际来信的政治局会议时,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却将他《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改题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在部分人中散发以显示其“高超”的理论,为四中全会定下“基调”。上述《斗争》一文中,提出“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尤其在世界革命高潮日益向前发展的形势下”,中国时局“在日益增长的革

命新高潮”“形势的成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分”。在这些区域里，党应加紧发动和领导“各种各式的斗争，从部份日常斗争到较大的政治发动”。“真正准备和创造武装起义的一切前提”，进而以“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为党的主要任务。文章批判“立三路线的实质便是‘左倾’词句下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消击”。对立三路线集中表现的城市中心论和急功近利地夺取大城市的“左倾”错误，反而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这就不难看出，王明提出的实质上是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新的“进攻”路线。在“国际路线”的大旗下，鼓吹“现在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强调“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提出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斗争”，不加区别地将所有中间派别一律看成是“反革命统治的忠实走狗”。“都是工、农、兵、贫民、革命学生的死对头”，同时，援引斯大林的一段话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逃亡者和背叛者，将比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知更多多少”^⑤。这话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自然很容易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起来，事实上已导致了其后的肃反工作扩大化。这篇文章宣扬的主要观点，便构成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因此，如果说立三路线的指导思想来源于教条主义，那么王明路线的思想也出于同一来源之处，再加上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就更大得多了。

六届四中全会后，实行“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向各苏区派出代表或代表团，改组或成立中共代表机构，对各地区的党组织采取大换班方式，将一批以拥护国际路线为名，实际